



經濟全球化的困境與前景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dux

劉遵義

研究專論第六十號

二零一七年九月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
香港新界沙田澤祥街十二號鄭裕彤樓十三樓

鳴謝

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衷心感謝以下捐助人及機構的慷慨捐贈
及對我們的支持 (以英文字母順序)：

捐助人及機構

查懋德	雅居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鄭海泉	亞洲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蔡冠深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胡祖六	銀聯金融有限公司
劉佐德及劉陳素霞	中國概念(諮詢顧問)有限公司
劉遵義	第一東方投資集團
利乾	四洲集團有限公司
梁錦松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李偉波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呂耀東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黃志祥	弘毅投資
孫少文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王庭聰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
榮智權	劉佐德基金有限公司
盛智文	敏華控股有限公司
	星島新聞集團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大生銀行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
	The Lanson Foundation
	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活動贊助人及機構

周松崗	盤谷銀行
蔡清福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方方	中國銀行金邊分行
方正	北山堂基金
馮國經	國家開發銀行
李偉波	金陵華軟
黃桂林	厚樸投資管理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金邊分行
	金陵控股有限公司
	新華集團
	The Santander-K Foundation
	銀聯國際

經濟全球化的困境與前景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dux[§]

劉遵義¹

2017年9月

摘要：經濟全球化包括跨國、跨境的商品與服務貿易和跨國、跨境的直接投資、證券與各種金融投資、跨國、跨境資本的流動、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的流動、人員與遊客的往來以及資訊的流通。每一個參與全球化的經濟體，無論大小，都會獲益。但與此同時，全球化在每一個經濟體的內部，也會創造贏家和輸家。但在很多經濟體之中，這些輸家並沒有被照顧到，所以他們就會對全球化質疑，認為全球化對自己不但沒有好處，反而有壞處，所以支持非全球化。因此假如全球化要持續運行，就需要考慮如何補償這些輸家。問題是市場機制本身無法調整分配，不會補償輸家，所以政府必須主導與採取積極的政策。

讓所有人民都能從全球化中得益，是每一個政府的責任。對於如何降低一個經濟體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社會成本，有幾個建議：一，課徵進出口稅；二，課徵托賓稅；三，強化社會安全網；與四，投資無形資本。

[§] © 2017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

¹ 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與美國史丹福大學李國鼎經濟發展講座榮休教授。此文為作者於 2017 年 5 月 9 日台灣中央大學余紀忠講座之修訂演講稿。作者感謝邱正雄博士，許家棟博士與余範英女士之寶貴意見與建議。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並不必然反映與作者相關各機構的觀點。

邱院長、範英、各位校長、各位教授及各位同學，今天非常榮幸能在這裡跟大家見面。余紀忠老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一位長者，我們兩家有幾代的交情，所以我今天能夠到中央大學擔任余紀忠講座的講者，覺得非常榮幸與高興。

今天的講題是「經濟全球化的困境與前景」，先談困境再講前景。對於全球化，我基本上是樂觀的，我認為困境是可以面對、可以脫離、可以克服的，前景也是光明的。

經濟全球化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全球跨國、跨境的商品與服務貿易和跨國、跨境的直接投資、證券與各種金融投資 (portfolio investment)、跨國、跨境的資本移動、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的流動、人員與遊客的往來以及資訊的流通，都可算是經濟全球化的一部份。經濟全球化其實不是一個新現象，早在西元前二世紀中國漢朝時就有張騫遠通西域，開拓了絲綢之路。歐美各國的全球化活動，開始得比較晚。西班牙人自十五世紀後陸續征服了拉丁美洲和菲律賓；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抵達印度、中國、台灣與日本等地；十七世紀，荷蘭和英國則分別有東印度公司作為他們全球化（及殖民）的工具；十九世紀，美國軍艦進入日本長崎港，強逼日本開放；二十世紀初，也有美國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s) 從事美中兩國之間的貿易。所以全球化並不是新現象，只是最近幾十年全球化的速度大幅提升，這其中的許多因素等一下會陸續說明。

對經濟全球化的質疑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湯瑪士·弗里曼 (Thomas Friedman) 寫過一本書，叫《地球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書中闡明全球化已經可以達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但現在很多人開始質疑全球化，這就是全球化面臨的困境。

這裡讓我先談一下，全球化可以給全球經濟帶來很大利益，總體來說，每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經濟體，無論大小，都會得到好處，只是有些經濟體受益比較多，而有些經濟體受益比較少。為什麼我這樣說？因為所有參與全球化的經濟體，它們所能選擇的商品與服務，都會比參與全球化之前大大增加，所以它們一定都會比以前好。

但與此同時，全球化在每一個經濟體內部，也會造成贏家和輸家。贏家就是出口商、進口商和進口商品與服務的消費者，輸家就是被進口商品或服務替代的產業和僱員。但由於各個經濟體一直都沒有太照顧到這些輸家，所以引發他們對全球化的質疑，認為全

球化對自己不但沒有甚麼好處，反而有壞處，英國脫歐就是在這種思維之下的反應，又如川普選上美國總統，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之下輸家的反彈。而本次法國大選落選的瑪琳·勒龐 (Marine Le Pen) 女士，也有很多反全球化的支持者，基本上可以說是由一群全球化之下輸家所擁戴的。

因此全球化如要持續下去，我們就必須考慮如何補償這些輸家。原則上，全球化之下每一個參與的經濟體都會得益，所以應當是可以沒有輸家的；這是因為全球化的利益應當是可以足夠讓大家分享，讓每個人都可以有進步，每個人都會比以前更好。問題在於市場機制本身無法調整分配，不會自動補償輸家，所以要達成這樣的結果，就必須由政府主導與採取積極的政策。

我的演講的英文題目叫做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dux**。「**Redux**」一詞根源自於拉丁文，其意為再次回來或是浮升的意思。目前經濟全球化已走到一個轉捩點，但在適當的條件與適當的政策之下，是可以繼續下去，再一次帶動全球經濟的發展。

首先，讓我們回顧過去，這幾十年來，全球的實質 GDP 與全球貿易總量皆增長快速（見圖 1）。紅色線顯示全球的實質 GDP，藍色線顯示全球貿易總量，紅色縱行顯示全球實質 GDP 的年增長率，藍色縱行顯示全球貿易總量的年增長率，可見在 2012 年之前，大部分時間都是全球貿易的增長率顯著地高於全球實質 GDP 的增長率。貿易總量比 GDP 增長得快，所以這段期間的全球 GDP 增長，可以說是由貿易增長帶動的。也因為如此，也促使全球的實質商品與服務貿易與全球 GDP 的比例，從 1993 年至 2008 年期間，持續大幅度上升，一直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為止（見圖 2）。

圖 1：全球實質 GDP 與全球實質商品與服務貿易總量及它們的增長率
(2015 年美元價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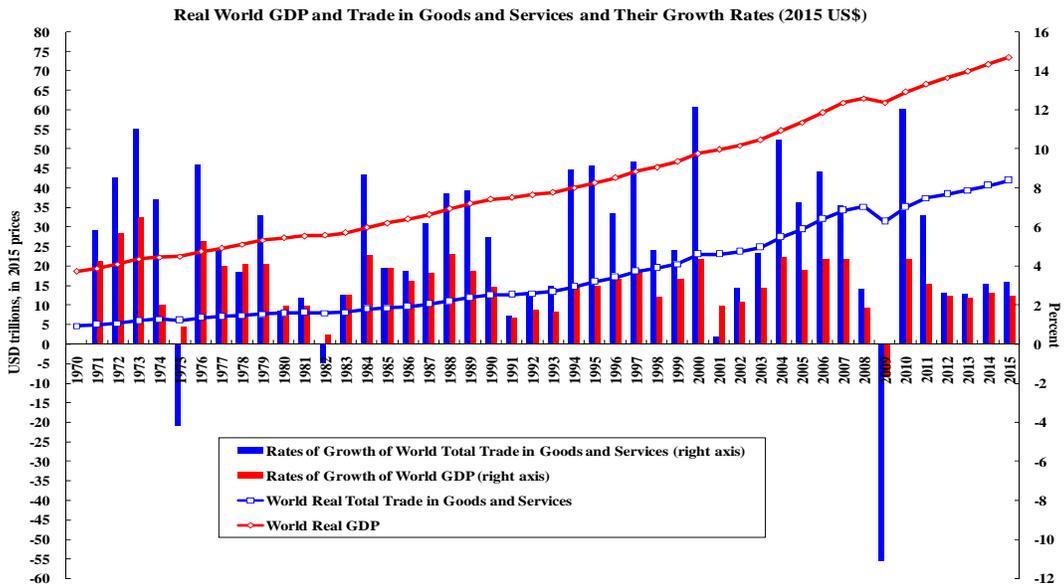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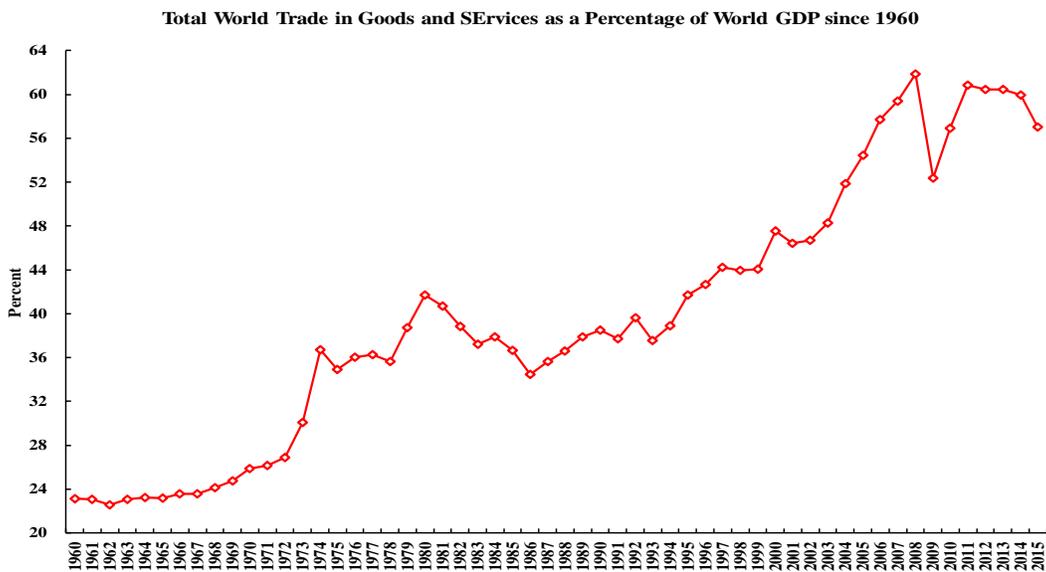


圖 2：自 1960 年起全球商品與服務貿易總量與全球 GDP 的比例



其實回想一下，在東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的經濟首先崛起，然後香港、台灣、新加坡與南韓亞洲四小龍的跟進，與後來的中國大陸經濟快速增長，其實主要都是由出口帶動工業化，由國際貿易增長所帶動的。所以，東亞經濟體得以從低收入發展到今天的水準，其實都是拜經濟全球化之賜。

但自從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貿易和全球 GDP 的增長速度呈現停滯現象。2008 年至 2015 年，全球 GDP 和全球貿易的平均年增長率已分別跌到 2.2% 和 2.5%，貿易不再是推動經濟的原動力。

全球貿易快速增長的原因

為什麼當年國際貿易會迅速增長？第一，早期的國際貿易存在許多貿易壁壘，如各種關稅和非關稅的障礙，世貿組織 (WTO) 成立之後，各會員國彼此對外都抱持比較開放的態度。而貿易障礙，不管是關稅的還是非關稅的，都逐漸減少。而且世貿組織也不遺餘力地推動自由貿易。此外，全世界也有許多自由貿易區，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和經濟共同體紛紛成立，這都有助於國際貿易增長。

第二，在過去幾十年間，全球經濟有很多新的參與者，比如中國大陸在 1978 年改革開放後開始參與，俄羅斯是 1990 年以後正式跨入今天的世界經濟，還有包括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國家等加入，從而促進貿易活躍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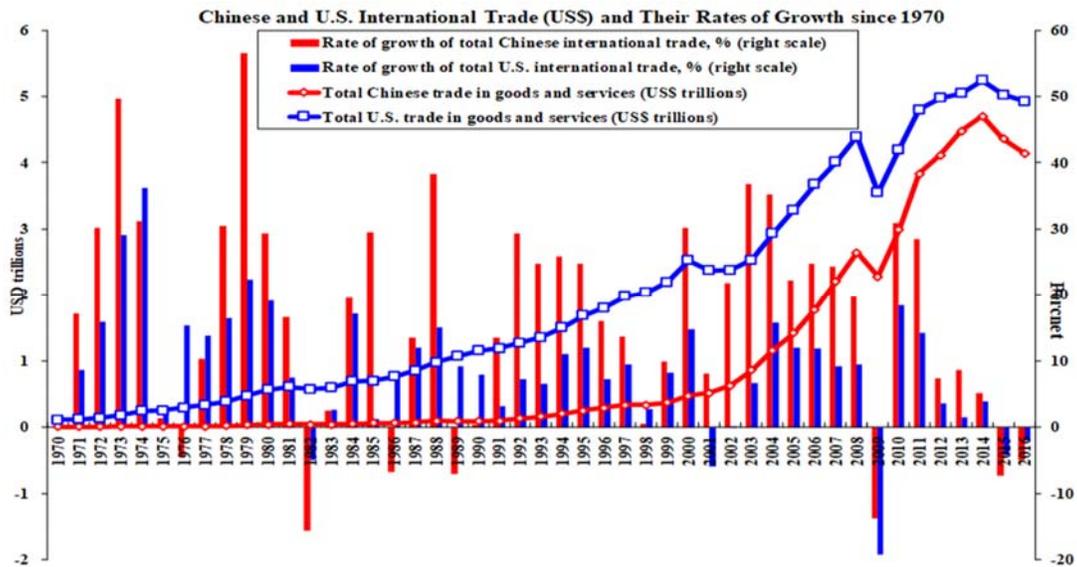
第三，是生產方式的碎片化 (fragmentation)，我也稱它為生產方式的非垂直化 (de-verticalization)。一個生產垂直化的企業意味着所有的零配件和所有的工序，都由企業自家生產作業。近幾十年來製造業最大的改變就是非垂直化，生產分工越來越細，很多產品採取跨國或跨境分工，部分企業只做供應鏈的一部份。以蘋果手機為例，晶片可能是台灣台積電生產的，但是記憶體可能是由韓國生產，螢幕可能在日本生產，最後則在中國組裝，所以生產供應鏈非常國際化。在生產非垂直化下，一個產品的各項零組件和半製成品可能來自很多國家，這些跨國分工都需要運輸與物流業支撐，而大幅度增加國際貿易的總量。

第四，是採用共同貨幣。2000 年歐元誕生後，在歐元區裡所有國家採用共同貨幣，只需在一個經濟效益最大的地方生產，就可以供應整個歐元區。以前歐洲共同體會員國之間，雖然沒有關稅，但是關稅只是貿易障礙的一部份，另外一部份就是相對匯率的波動性。舉例來說，採取共同貨幣之前，產品應該由德國生產，運到法國，抑或由法國生產，運到德國，就要考慮到德國馬克跟法國法郎的相對匯率問題。有了共同單一貨幣之後，如果在西班牙生產就可供應全歐元區，那就不必再考慮匯率因素。未來如果歐元崩潰，後果對歐元區將難以想像，所以應當不會發生。

第五，是交通、運輸與通訊成本的大幅度降低。這促使商品貿易大量增加。而通訊成本的大幅降低，也促使服務貿易大量增加，使服務業也開始全球化。很多後勤、後台辦公室就都隨着全球化搬遷到更便宜的地方。例如在美國打電話去查號，接聽電話的客服中心可能設在印度或菲律賓，因為通訊成本大幅降低，如果後勤辦公室設在這些低工資的國家，成本將比在美國低廉很多。因此，在全球化之下，能夠遷走的就業機會都會被遷走，但旅遊業是遷不走的，觀光資產是屬於當地的。此外，大學也是遷不走的。你要來台灣旅遊就得真的要來台灣，你要就讀中央大學也得來台灣。

美國跟中國現時在是兩個世界最大的貿易大國。圖 3 顯示自 1970 年起中國與美國各自的貿易總量與其增長率。藍色線顯示美國的貿易總量，紅色線顯示中國的貿易總量；藍色縱行顯示美國貿易總量的年增長率，紅色縱行顯示中國貿易總量的年增長率。從圖 3 可以看出，這兩個國家的貿易總量過去一直都在上升，其中中國大陸的貿易增長率，除了少數年份外，均遠遠超過美國，所以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貿易國，僅次於美國。但兩年前美中兩國的貿易總量雙雙開始下降，也局部反映全球化面臨的困境。

圖 3：自 1970 年起中國與美國各自的貿易總額與增長率



值得觀察與提醒的是，在全球化的浮沉中，國別貿易與境內生產總值 (GDP) 比例的變化，在大經濟體和小經濟體是不同的，因為它們對於國際貿易的倚賴性不一樣。讓

我們就中國跟美國這兩個世界最大的貿易國來做比較，中國跟美國都是很大的經濟體，經濟成長主要還是以內需為主導，出口不是非常重要。但是對於台灣與香港這種小型經濟體就不一樣了，出口就非常重要，出口佔 GDP 的比例有時會大於百分之一百，出口對經濟成長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

資訊通訊革命加速經濟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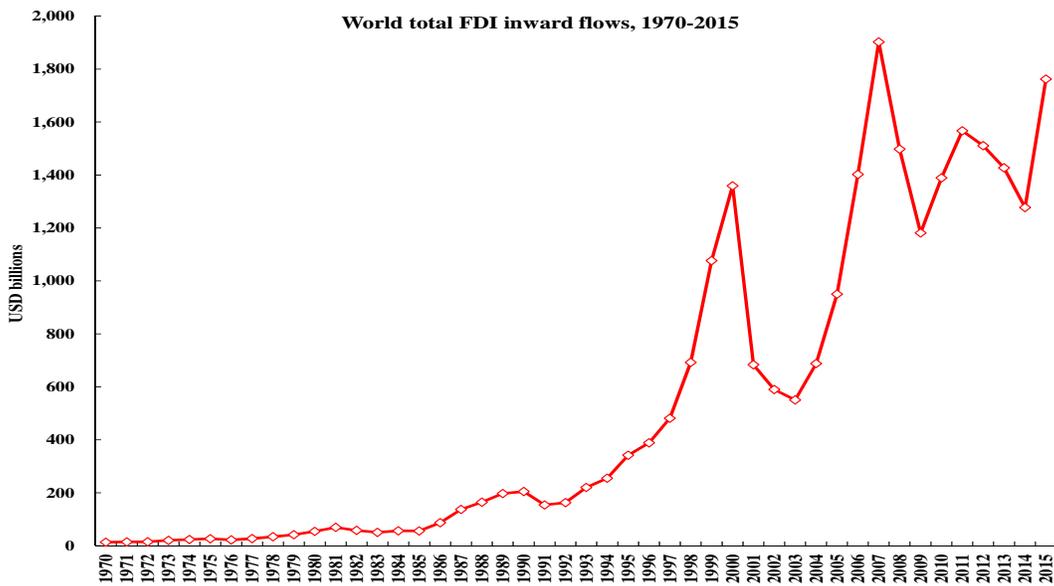
首先，資訊跟通訊的技術革命正在演化，全世界訊息傳播快速，不論在任何地點發生甚麼新聞，馬上就可以知道。同樣，分公司的營運狀況，總公司也可以立即掌握，地理距離已經不是大問題，例如在台北就可以控制高雄甚至上海的工廠，這也是資訊跟通訊發達所造成的。

全球使用英語作為共同的商業語言，也加速了全球化的腳步，例如英國脫歐，留在歐盟裡面用英語的只剩下愛爾蘭跟馬爾他兩個比較小的國家，有人開玩笑說，歐盟是不是要改用德文或法文。我認為在看得見的未來，英語應該還是世界第一通用的商業語言。

全球化擴大了市場，令資本回報率提高，特別是無形資本的回報率。例如專利權，創造專利權的成本是固定的，所以假如市場能夠再擴大，所得的便都是淨利。這就可以理解為甚麼中國大陸對蘋果這樣重要，因為蘋果 iPhone 只要靠美國市場就夠回本，再開發一個中國市場就是淨賺的了。

國際貿易增長的同時，跨境的外人直接投資 (FDI) 也在增加。它增加的理由是，因為很多國家開始歡迎外國直接投資，撤除各種投資與貿易障礙，同時祭出種種的優惠措施，例如免稅五年的優惠等等，所以，外人直接投資增長得很快。從圖 4 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機開始之前的 1970-2007 年這段期間，平均每年增長率是 14%，非常高，而且 2007 年那一年的金額高達一兆九千億美元；在金融危機之後，就變成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下降，所以全球化的困境包括全球的貿易量在下降，且外人直接跨境投資量也在下降。

圖 4：全球外人直接投資 (FDI) 總額



跨國資本移動的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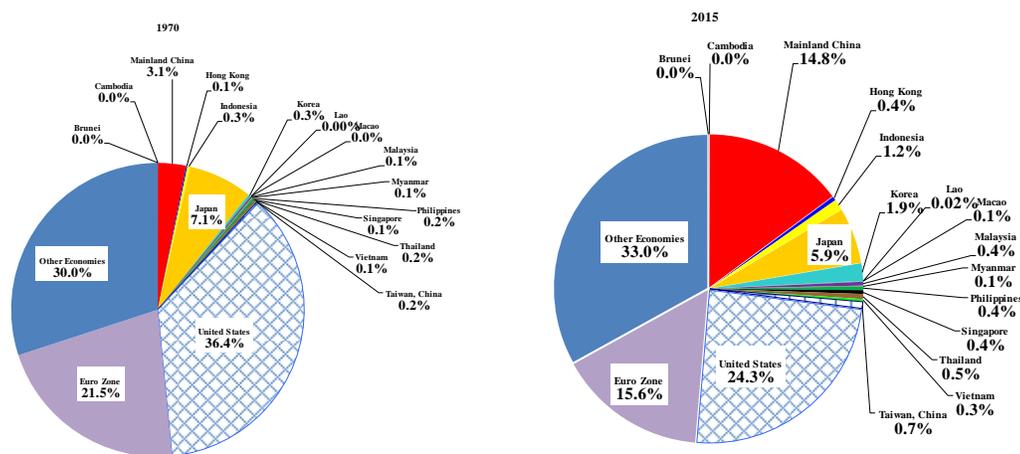
近十年來，跨境資本的流動大大增加，尤其是短期資本（所謂熱錢）大量增加。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實行量化寬鬆，日本、歐洲中央銀行等也跟着實行，全球貨幣流動性多得不得了，但利率非常低，資本都往回報率稍微高一點的地方流進流出，也造成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只是短期資本，流進流出的速度很快，不像長期資本這麼穩定。外國資本流入一般是短期的，如果當地企業利用這些資本作稍為長期的投資，就會有下面兩個不對稱：第一個是期限不對稱 (maturity mismatch)，國內的投資要長期，但國外資本是短期的，一旦外國資本要撤資就會有不能償還欠款的麻煩；第二個就是貨幣不對稱 (currency mismatch)，本國欠的國外借款是用外幣來計算的，假如匯率變了之後，尤其是本國貨幣大幅貶值之後，恐怕也不一定能償還得了所有的借款。所以短期資本流入其實是弊大於利的，但是全球現在還是有很多的短期資本在流動。

全球經濟重心轉移到東亞

全球化的影響體現在全球 GDP 的地理分佈上。第一，全球化造成全球的經濟重心的轉移，從美國和西歐轉移到東亞；在東亞之內，則從日本轉移到中國大陸。這些趨勢現在還在演化中，因為印度跟中國大陸現在已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兩個經濟體。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 (Angus Maddison) 教授曾提到，在十八世紀時，中國大陸佔全球的 GDP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以後恐怕也會恢復到百分之三十，現在只有約百分之十五，還需要一點時間。而美國和西歐佔全球 GDP 的比重會繼續下降。

由圖 5 可見從 1970 年到 2015 年全球 GDP 比重的變化。左圖是 1970 年各國與各區域佔全球 GDP 的比例，當時中國大陸的 GDP 只佔全球的 3.1%，到了 2015 年（見右圖）已達到 14.8%，增加了差不多五倍；美國當年是佔 36.4%，現在已經降到 24.3%；日本當年的比例是 7.1%，現在也降至 5.9%，都在下降；歐元區的比例則從當年的 21.5% 降至現在的 15.6%。看得出來美國和歐洲在全球 GDP 的份量已經在持續下降，所以世界經濟的重心其實在繼續轉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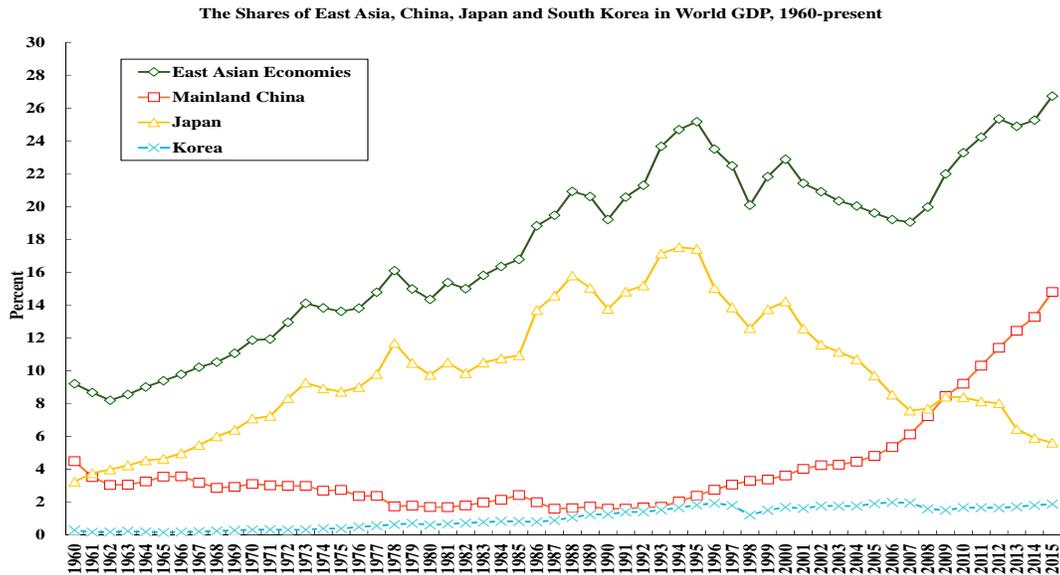
圖 5：全球各國與各區域佔全球 GDP 的份額：1970 年與 2015 年



在東亞之內，經濟重心則從日本轉移到中國大陸（參考圖 6）。圖 6 顯示 1960 年迄今，日本、中國大陸和韓國分別佔全球 GDP 的比重。綠色線表示東亞，它佔全球 GDP 的比重已經超過 25%；黃色線是日本，最高時一度佔全球 GDP 的 18%，現時只佔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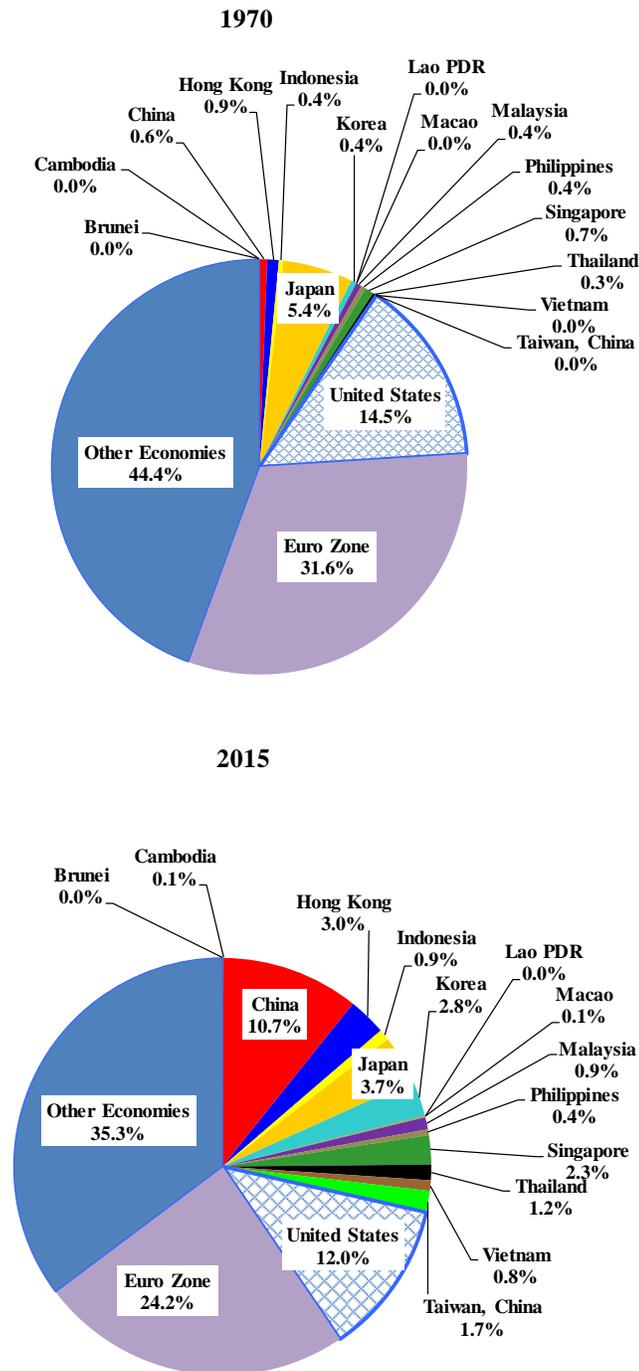
左右；紅色線是中國大陸，自 1990 年開始持續上升，於 2010 年超越日本，現時佔 14%，還在繼續上升之中；淺藍色線是韓國，約佔 2%。

圖 6：1960 年至今，東亞、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佔全球 GDP 的份額



從圖 7 也可以看出，全球國際貿易的分佈也有同樣的趨勢。在 1970 年，中國大陸貿易總額佔全球的比例僅為 3.1%，至 2015 年則達到 14.8%，美國則從 36.4% 下降到 24.3%。

圖 7：全球商品與服務國際貿易的分佈, 1970 與 2015 年



第二：因為世界經濟重心從美國、西歐轉移到亞洲，就產生了「局部脫鉤 (Partial De-Coupling) 假說」。三、四十年前，東亞國家的主要進口夥伴是美國和西歐，東亞經濟要仰賴美國和西歐支持，這些地區的經濟狀況好壞會影響東亞經濟，但是最近這二十

年轉變了。由圖 8 與圖 9 可以看出，東亞出口到東亞區域本身的比例，已接近百分之五十，而源自東亞區域內的進口也佔百分之五十。在美國經濟不景氣，西歐經濟不振的情況下，東亞經濟不會太好，但也不會太壞，因為還可以靠東亞自己的內需，繼續運作。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東亞各經濟體仍有不錯的表現，特別是中國大陸，在 2008 年之後，仍能保持平均 6.5% 以上的年增長率。

圖 8：東亞出口到東亞自身區域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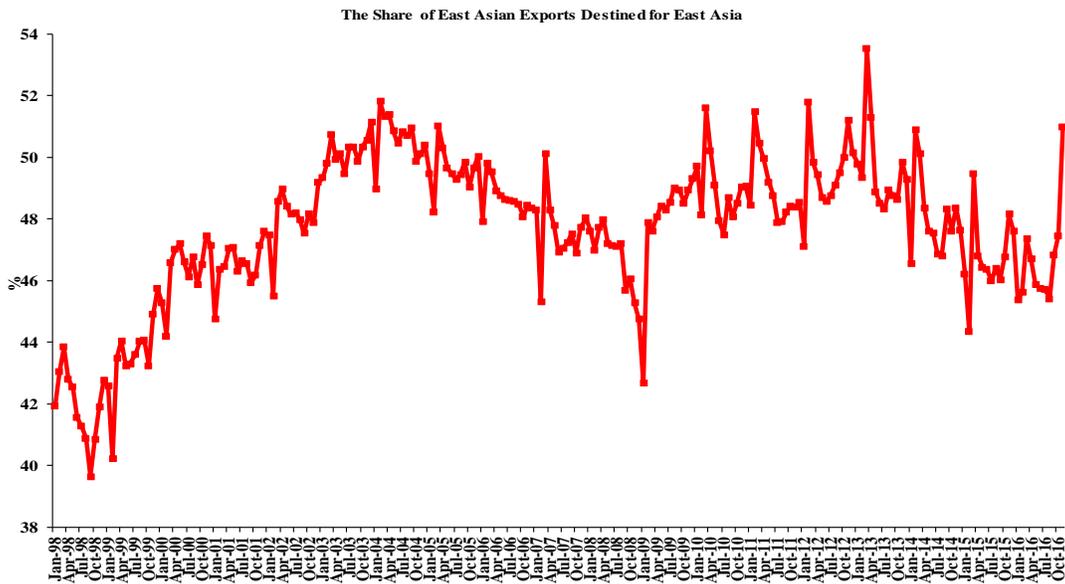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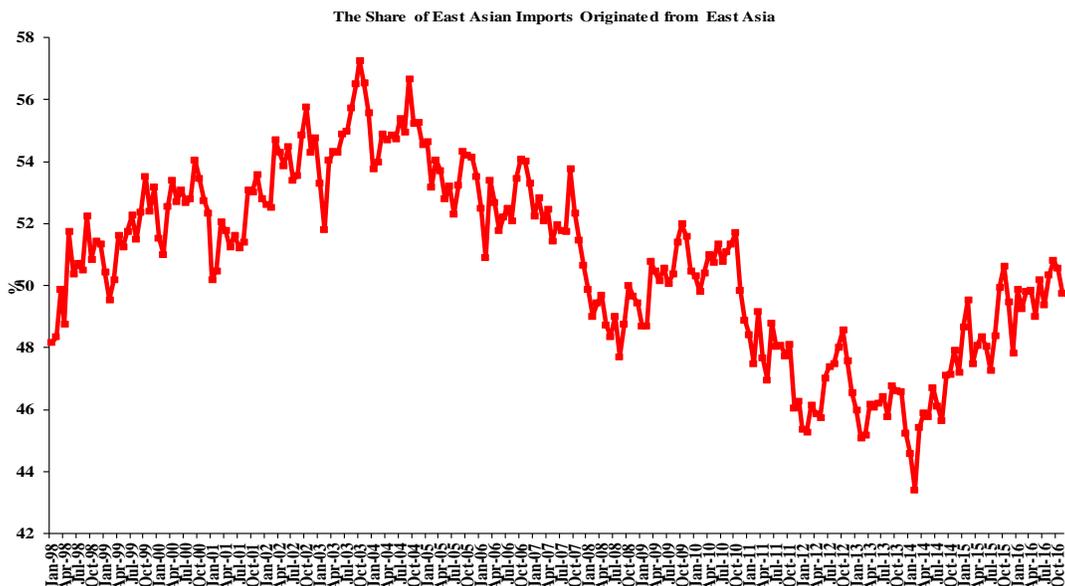


圖 9：東亞進口源自東亞自身區域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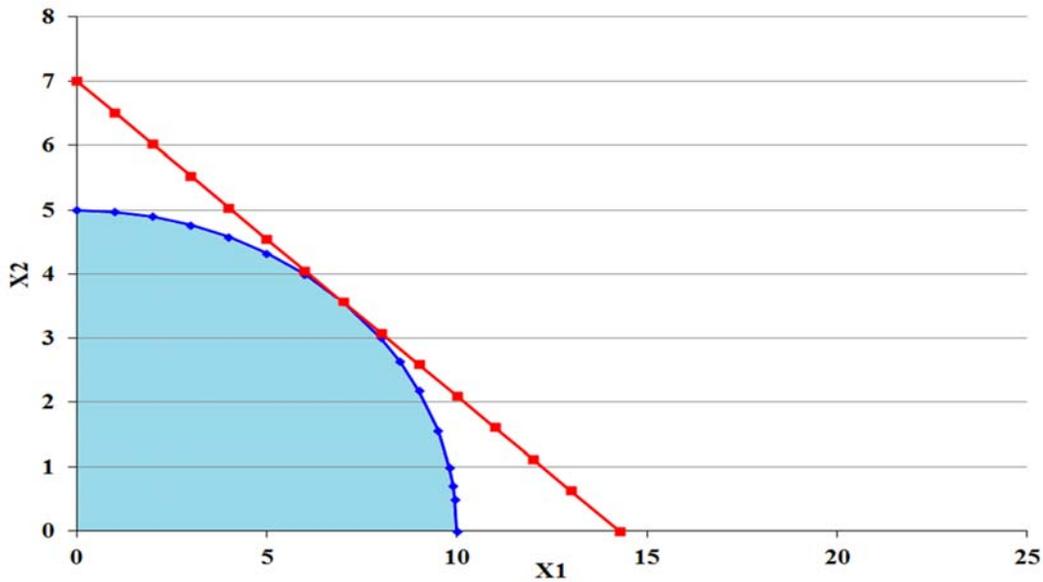


經濟全球化的好處

經濟全球化究竟有甚麼好處呢?首先，自願跨境貿易一定是雙贏的。此外，在全球化之下，資本的配置會更有效率，規模報酬更容易達到，而無形資本的回報率因市場擴大，也會升高，主要是因為發明創新的成本是固定的，市場愈大，回報率就會愈高。同時，全球化可促進技術與知識的傳播，並透過旅遊或留學，增進人民跟人民之間的來往交流。有些全球問題也需要各國一起來商議處理，比如氣候變化的問題，是單一國家無法解決的，一定要聯合起來，這也是全球化的好處。最後是國際貨幣鑄幣權 (seigniorage) 的效益，關於這一點我在下面會說明。

兩國之間自願貿易一定是對雙方都有利的，這一點可以用圖 10 來說明。圖中藍色部分包括外部的藍線，顯示在這個經濟體裡面能夠生產出來的兩種商品 X1 和 X2 的所有可能搭配，稱為一個經濟體的生產可能集合 (set of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同時也等同於在不進行國際貿易之下這個經濟體的消費可能集合 (set of consumption possibilities)。圖 10 中的紅色直線是兩種商品 X1 和 X2 的國際相對價格線，如果一個經濟體不從事國際貿易，則它只能消費它本身所能生產的，亦即它的消費可能集合就是它的生產可能集合。如果一個經濟體從事國際貿易的話，它可以根據圖中紅線所代表的國際價格來跟其它經濟體進行貿易，這個經濟體便可以用 X2 來交換 X1，或用 X1 來交換 X2，所以無論在紅色線與兩軸之間（整個三角之內）任何一點的消費組合都是做得到的，這表示有很多消費商品搭配的選擇，是不從事貿易之下選擇不到的。不從事貿易，只能選擇在藍色線範圍內的商品搭配。可見在從事貿易之下能選擇的消費搭配多了很多，所以一定會更好，不可能是失利的，因為最壞的可能就是不貿易，也不會比以前壞。每一個經濟體，從不參加國際貿易到參加的話，絕對是會得益的。

圖 10：自給自足與國際貿易下的消費可能集合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討論。國際貿易一定會讓貿易夥伴雙方都有好處，但是在兩個貿易夥伴之間，究竟誰得的好處比較多？這是很難界定的。所以當川普說美國吃虧了，並不是說美國沒有好處，他知道全球化對美國有好處，他的意思是，美國是有好處，可是大量的好處都是讓中國大陸、日本跟德國佔去了，而美國拿到的好處不夠多。

另外一個問題是：雖然全球化對整個經濟體來說是好事，但全球化會在每一個經濟體的內部，創造贏家和輸家，構成一個經濟體內部的利益重分配問題。誰會成為國際貿易的贏家和輸家？參與國際貿易的贏家首先是出口商，因為他們多了國外市場，在出口商品上創造利潤和就業機會。其次便是進口商與進口商品的消費者以及使用者（包括使用進口零配件的國內廠商），因為進口商品可能比較便宜，品質比較好，比較多的選擇與供應更多元化。可是誰會是輸家呢？輸家就是跟進口商品競爭的國內產業。由於進口商品能夠代替國內所生產的商品，所以會影響這些國內產業與它們的僱員，有些人會失業，而且有些企業甚至會關門。這就是為什麼每一個經濟體的內部，都有些人傾向於保護主義或孤立主義，因為政府沒有好好地補償和照顧這些輸家，未能讓經濟全球化的好處為全民分享。這個問題，過去各國政府都沒有好好地處理。這就是全球化面臨的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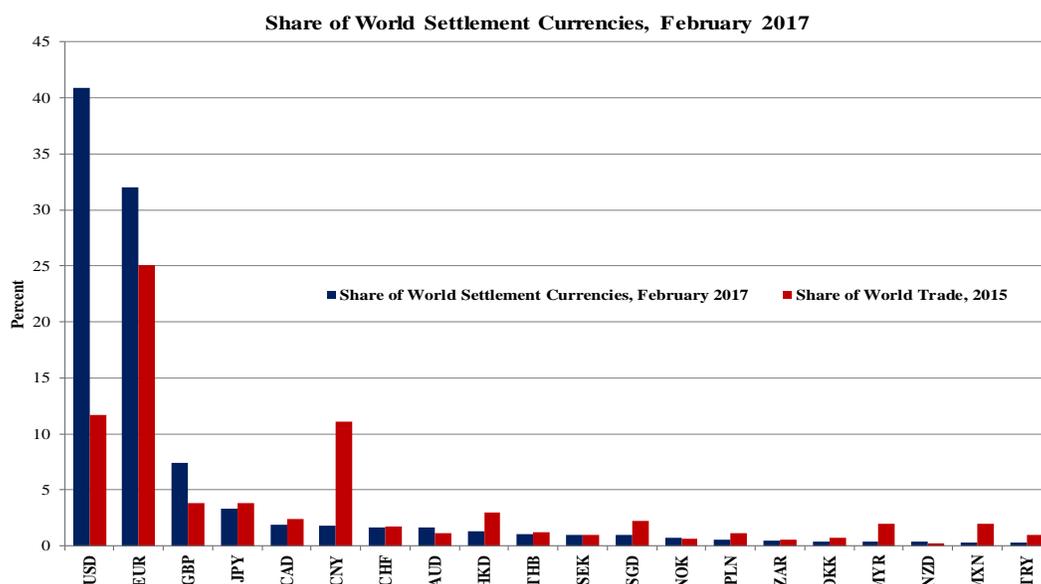
困境。原則上，國際貿易應當產生足夠的好處讓大家都分享，但以前差不多沒有政府好好地面對這個問題，現在已無法避免，需要嚴肅處理和解決這個問題。

美國獨享「鑄幣權」

接下來我想講剛才提到的鑄幣權。兩個國家要貿易，如果彼此都不相信對方的貨幣，就需要使用彼此都能相信的第三方貨幣作為貿易的媒介，而美元則往往是第三方貨幣的第一選項，是最常被使用的國際交易貨幣，因此美國佔了很大的便宜，這個我稱為鑄幣權。就是說，美國政府有權印美元，假如一個經濟體需要美元，就要賣東西給美國，才能得到美元。美國只需要利用它印刷的鈔票，就能換取進口的商品，這就是鑄幣權。美元其實是一個國際流通的貨幣，是由美國供應的。原則上，賺到美元的經濟體可以利用這些美元向美國進口商品與服務，但它需要儲備美元，應付與其它貿易夥伴的交易，所以不會全部用來向美國進口。（此乃台灣中央銀行有很多美元儲備，中國大陸人民銀行也有很多的外匯儲備的原因）。這樣一來，美國就可以享有很大幅度和很長期的貿易逆差，同時美元儲備所能獲得的利息也很低，而讓美國占了很大的便宜。

從圖 11 中可見，因為很多貿易夥伴彼此不相信對方的貨幣，而使用美元來清算與結算，所以 2017 年雖然美國只佔全球的貿易總值約 12% 左右，但全球用美元支付結算的貿易卻佔了約 40%。在 2017 年排名第二的支付貨幣是歐元，約 30%，但歐元區貿易裡面有很多是區內的國際貿易，當然是利用歐元結算。所以其它第三國多半是利用美元。排名第三的支付貨幣是英鎊。中國大陸佔的貿易比例是相當高的，超過 10%，但利用人民幣來結算的國際交易現時還不多，只有 2% 左右，低於日圓與加拿大元。

圖 11：2017 年各個國家其貨幣佔全球貿易結算貨幣與全球貿易份額



美國從 1980 年到現在，累積的貿易逆差是十兆美元，即是它進口的十兆美元商品與服務，是用印鈔票和債券的方式來結算，同時債券的利率也很低。假如美國在國際上真的欠人家十兆美元的話，每年得到的好處就是在利差。美國利率跟其它國家利率的利差，假如是 1% 的話，每年就有一千億美元的淨利益，這雖然不是實際的數字，但也可說明鑄幣權對美國有很大的好處。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社會問題

我先談全球化帶來的社會問題，然後我還希望提出一些解決問題的建議。第一，全球化下除了贏家之外，一定會有輸家，而且市場不會自動補償輸家。把全球化帶來的整體利益，一部份用來補償輸家，是政府與社會的責任。

第二，全球化之下競爭非常激烈，因為全球所有的經濟體都是彼此的競爭對手。大家還記得幾十年前，台灣是全球最大的製鞋國，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一雙鞋是台灣製造的，因為隨着台灣的工資上升，勞動力成本變高，製鞋業都移到中國大陸，但現在中國大陸的成本也高了，製鞋業都又遷到越南、柬埔寨與孟加拉等地。

第三，我要談一下要素價格平等化定理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這是由諾貝爾獎經濟科學獎得主保羅·薩繆森 (Paul A. Samuelson) 教授所提出的。他說各國同樣的生產要素，例如沒有技能的勞動力，在假設全球貿易完全自由及沒有運輸費用的情況下，其價格就一定會下降到等同於全球最低的水平。全球沒有技能的人最多，工資最低，是在什麼地方？可能是非洲。人不需要移動，因為產業會移動，在美國也好、台灣也好、香港也好，能夠搬走的就業機會都已經搬到較便宜的地方去了。這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沒有技能的勞動力一定會面臨工資不但不上升，反而會下降的問題。所以美國最近這一、二十年所有藍領工人薪資都沒有增加，反而是那些技術人員、工程師、與資訊通訊業僱員的薪水都高升，這都是事實。

第四，假如政府不想辦法去補償全球化的輸家，結果將是國內的所得分配會越來越不平均，這不只台灣如此，美國、香港，甚至全球都有這種現象。正如《21 世紀資本論》作者湯瑪士·皮凱堤 (Thomas Piketty) 所提出，在每國國內的所得分配都是變得更不平均。但其實在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分配差距，倒是在收窄。在中國大陸境內所得分配是非常不平均的，可是整體收入在上升。所以從全球角度來看，全球的所得分配倒是越來越趨向平均的。

第五，當然我們看到，全球化下有很多機會讓一些企業去壟斷整個全球市場，像蘋果 (Apple)、谷歌 (Google) 跟微軟 (Microsoft)，它們不是寡頭，就是準寡頭。再如亞馬遜 (Amazon)，如果不是大陸有阿里巴巴和百度，可能老早就打進大陸市場了，會比現在更大。為了保護消費者的利益，政府的監管是必須的，不能讓企業有太多的寡頭行為。以美國經驗而言，如當年沒有司法部對 IBM 的反壟斷判例，可能就不會有微軟；如果沒有對微軟的反托拉斯判例，也不一定會有蘋果與谷歌。讓企業太獨佔市場，不只消費者會吃虧，也會阻撓技術進步。

第六，全球化會擴大境外發展對經濟的影響。從下面的圖 12 可以看出，大的經濟體，像日本、中國大陸跟美國，對於出口的依賴度是很低的；但香港跟新加坡都是很高的。從圖 13 至 14，可以看到雖然大經濟體的出口增長率的波動幅度與小經濟體的差不多；而進口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差不多。但是圖 15 顯示，大經濟體的實質 GDP 的增長率的波動性比較低，不太受外部波動的影響。而香港和新加坡是小型經濟體，受到的影響就很大。台灣當然也不是大經濟體，所以就需要建構較完善的社會安全網來減緩外部影響的衝擊。

圖 12：東亞、印度及美國商品與服務出口佔 GDP 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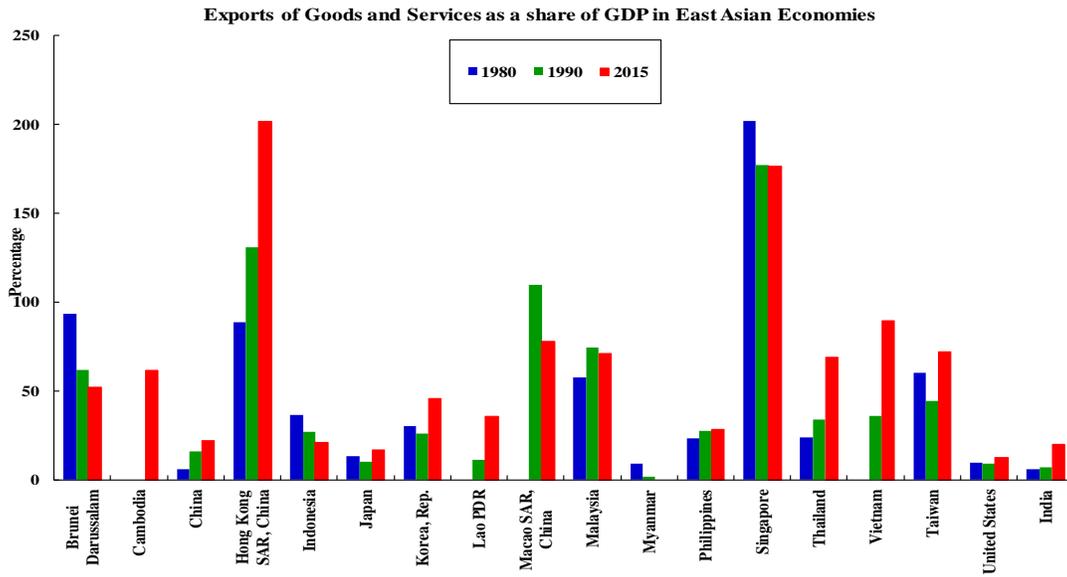


圖 13：部分東亞經濟體商品出口的季增長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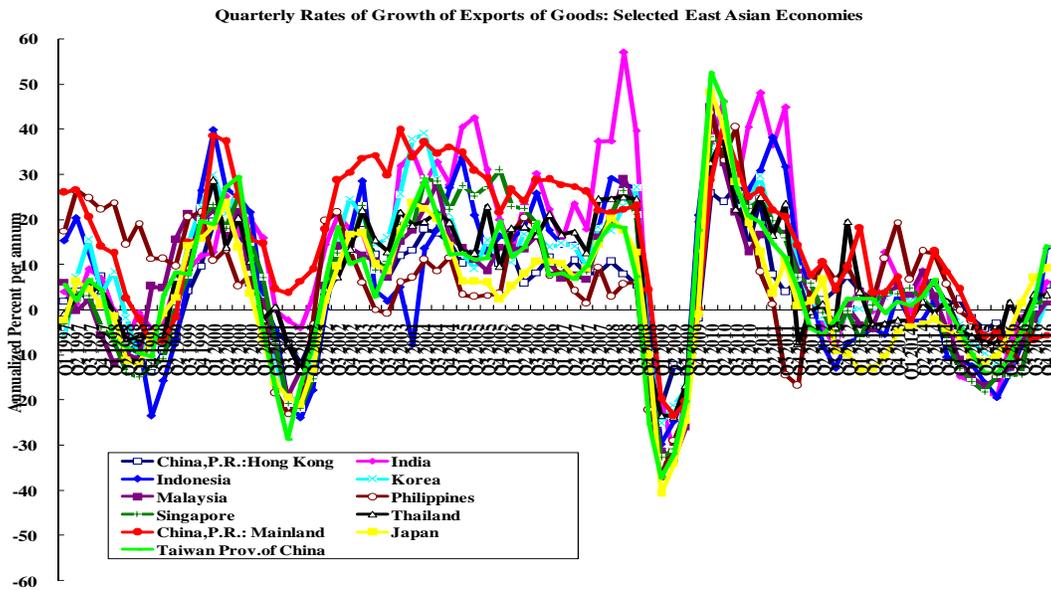


圖 14：部分東亞經濟體商品進口的季增長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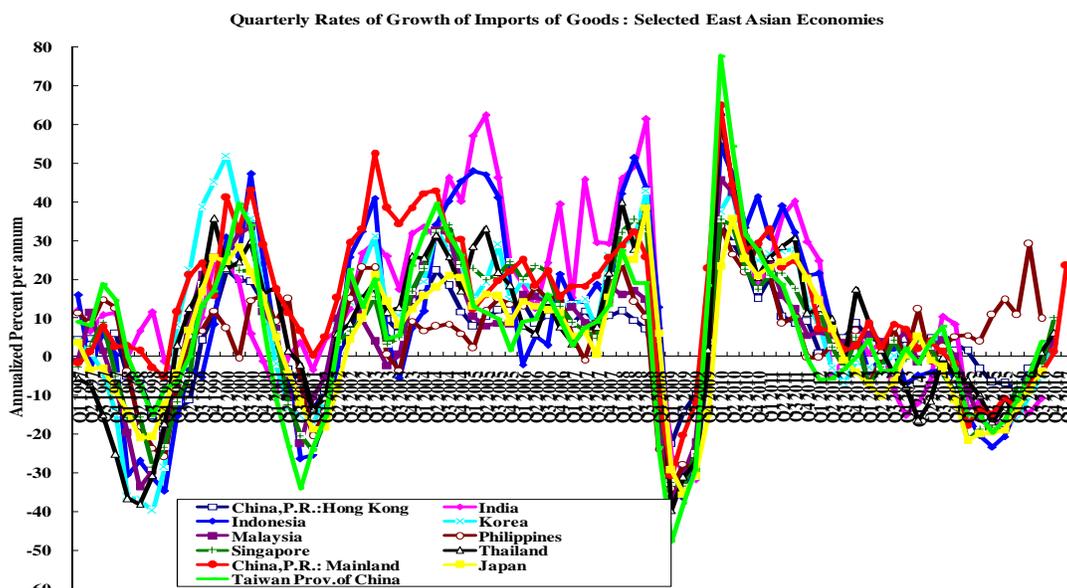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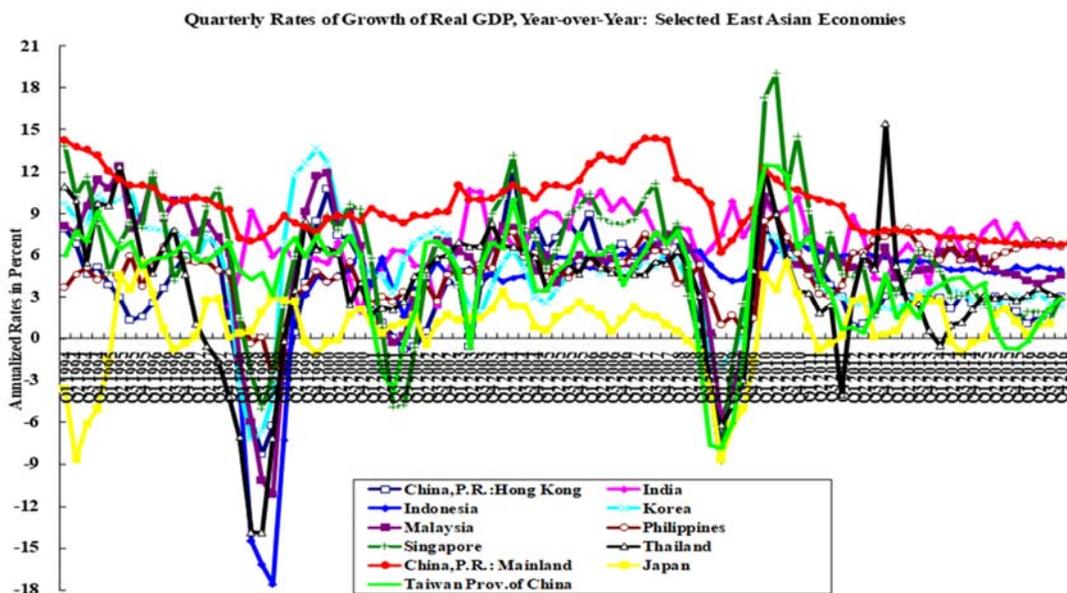


圖 15：部分東亞經濟體實質季 GDP 對上年同季的年增長率



第七，在全球化下，流通性氾濫，短期資本到處跑，時進時出，會影響一些小經濟體的外匯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增加風險。東亞國家在 1997 與 1998 年就因短期資本大量撤出而釀成金融危機。短期資本流入流出，需要監控，一不小心就會出事。

降低全球化的社會成本

如何能夠降低全球化對一個經濟體的社會成本？

第一，課徵進出口稅。輸家必須受到補償。要怎樣補償呢？建議由贏家付一點稅，這稅要怎麼收呢？我覺得很簡單，就是針對所有出口商品，加徵 0.5% 或者是 1% 的稅；對所有進口商品也是一樣。總之進、出口都課同樣的稅。這是什麼道理呢？出口商當然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進口商也是進口利潤受益者，所以要他們付一點稅，其實很公道，進口商也可以把稅轉嫁到進口貨品的消費者與使用者身上。這些稅收就可以拿來補償那些因為國際貿易喪失就業機會或薪資降低的人。假如是年輕人，就重新培訓他們，增進及加強他們的工作技能，讓他們再就業；而 55 歲之上的中老年人，反正到 65 歲就要退休了，因為他們年紀大，重新培訓不一定有效，也只能再工作幾年，建議讓他們拿長俸。要這樣做才能把輸家變成不輸，可能讓他們贏一點，不然，全球化是可能走不下去的。進出口同時都課同樣的稅，也可以避免造成價格的扭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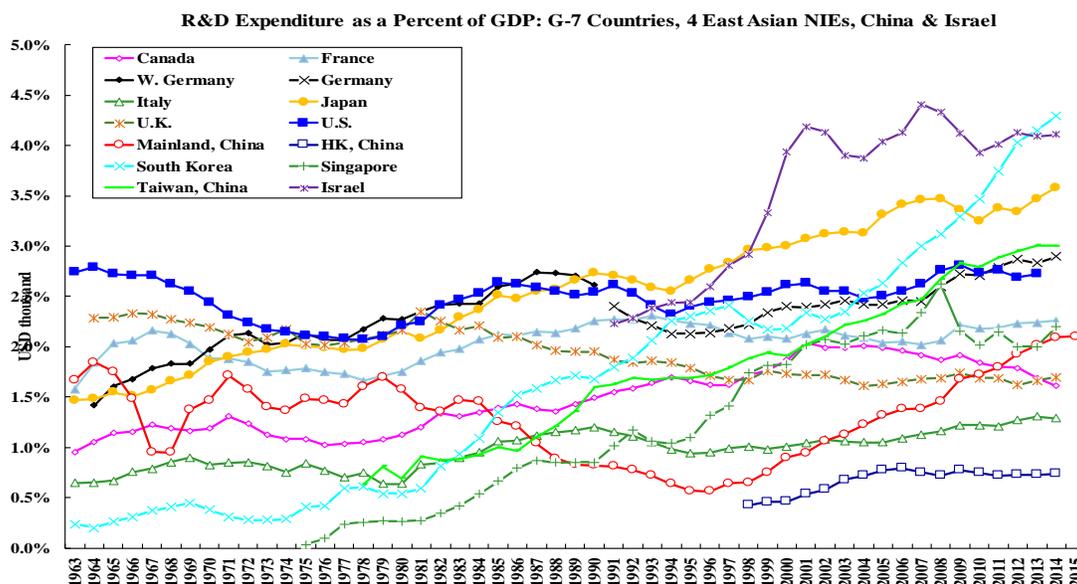
第二，課徵托賓稅。要減少短期資本的流進流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得主詹姆士·托賓 (James Tobin) 教授提出的托賓稅 (Tobin tax)。他在 1972 年提出建議，針對跨境資本流動課稅。例如資本從國外匯進台灣，就課 1% 的稅，匯出時也要再課 1% 的稅。如果是五年的長期投資，一進一出總共要課 2% 的稅，但經五年一分攤後，每年成本只有 0.4%，不太會影響投資者的長期投資計劃，可以承受。反之，打算把錢匯進來，作短期投機，炒新台幣匯率升值，一個月就走，年利率成本就變成是 24%，如此投機者就不會選擇來台短線炒作。所以徵收托賓稅可以區別短期資本和長期資本。長期資本的流入是有助於一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而且長期資本相對穩定，而投資者亦希望這個經濟體可以繼續增長，這對被投資經濟體是有利的。短期資本流入基本上是投機的，只匯率炒高一點便離場，或是賣空被投資國的匯率，賺了錢就走，這會影響該經濟體匯率以及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也會對其經濟造成負面衝擊。其實利用外國短期資本作長期投資的風險是很大的，東亞國家在 1997、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吃過很大的虧。所以我們應當鼓勵長期資本流入（或流出），不鼓勵也不歡迎短期資本流動。

第三，改善強化社會安全網。國際貿易會使國內的在全球化下，和進口產品與服務競爭的產業可能會萎縮，而產生結構性失業；其次，經濟和國際連動愈密切，一旦國際經濟波動，便會受影響，例如美國不景氣馬上會使台灣對美國出口減少，從而產生週期性失業。要協助這些週期性失業的人，就需要建立社會安全網。更需注意，在今日這轉

變迅速的社會，不可能一個人 22 歲找到工作便終身做到 65 歲不變，每個人都需要終身學習與再訓練，社會有維持失業人口生計與再就業的責任。

第四，強化對無形資本的投資。無形資本其實是指人力資本與研發 (R&D) 資本，它們是創新最主要的元素，沒有研發投入就很難有創新。也是驅動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已發達的經濟體。圖 16 顯示 R&D 投入佔 GDP 的比重，台灣、韓國跟日本的比例，相對其它國家，都算是高的。因為全球化下的競爭相當激烈，不持續創新的話就會落後，落後之後就不太容易再趕上。例如台積電一直很重視研發，是台灣研發金額投入最高的企業，所以它能一直維持世界晶圓代工的龍頭地位。

圖 16：G7 國家、亞洲四小龍、中國與以色列研發支出佔 GDP 的比重



另外，圖 17 顯示一些國家在美國拿到獲得的專利權數，美國排第一，日本排第二，台灣跟韓國的排名也都相當高，而中國大陸也在趕上。

圖 17：G7 國家、亞洲四小龍、中國與以色列在美國取得的專利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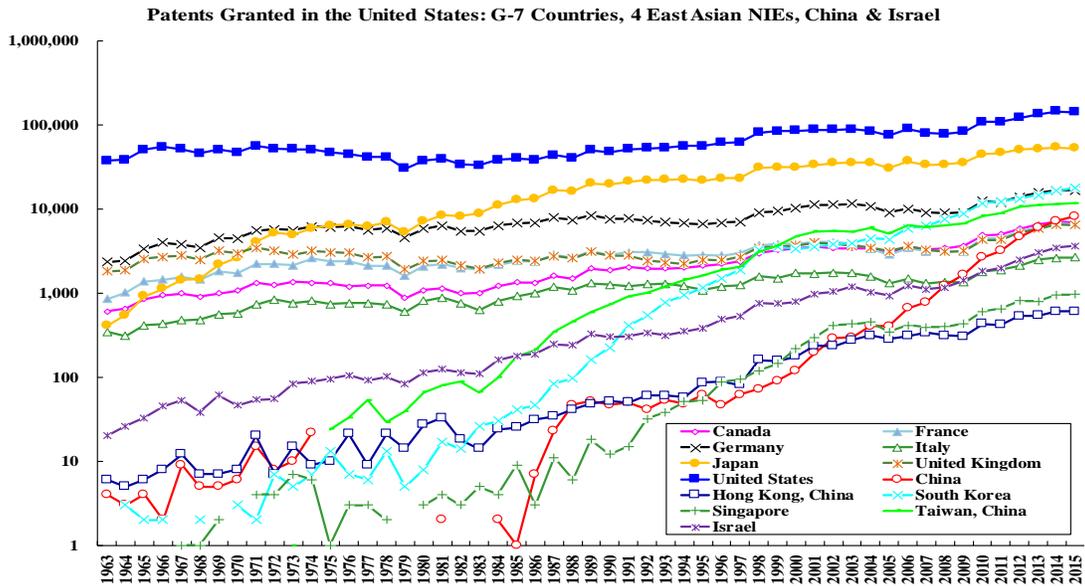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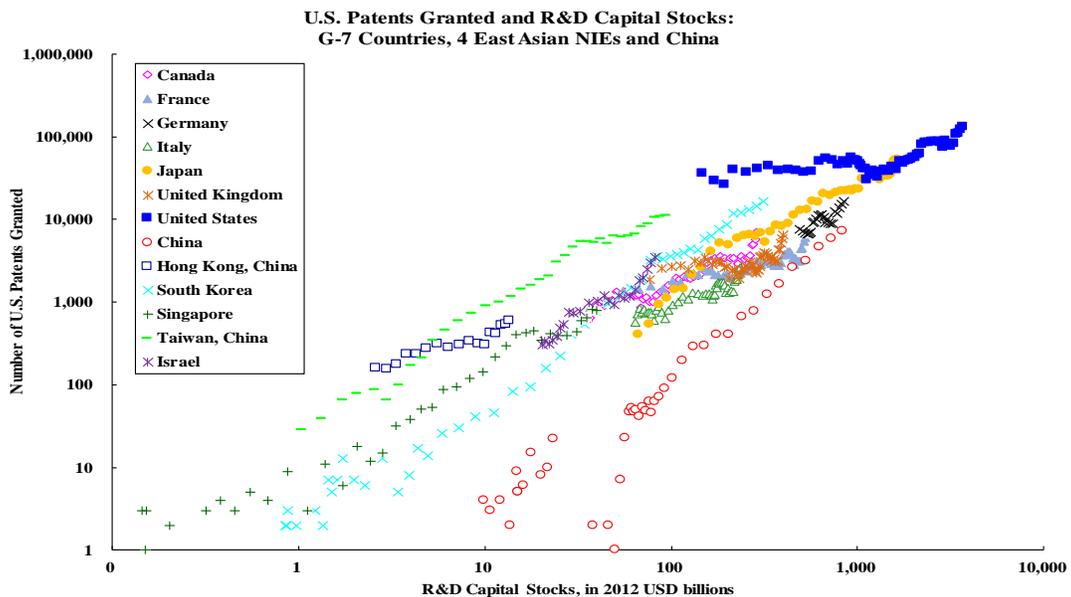


圖 18 則顯示專利權數跟研發資本存量有相當密切的正向關係，從研發資本跟獲得專利權的數字來參照，可以發現研發資本越多，獲得的專利權數也就越高，發明與發現都需要投入。

圖 18：G7 國家、亞洲四小龍、中國與以色列在美國獲得的專利權數及研發資本存量



結語

經濟全球化對所有參與全球經濟的經濟體都帶來了很大的利益，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全球化也在這些經濟體之內，創造了贏家和輸家。所以，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要如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內部好好地再比較均勻分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而且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是需要政府主導，作重分配，讓所有人民都能得益，這是政府與社會的責任，而不能單靠市場。在轉型調整的過程中，市場不會照顧或再培訓那些因全球化而被進口影響因而失業的人，也不會負擔這些人的生活。政府應當能夠做到沒有輸家，這樣全球化才可以持續下去。

像台灣這樣的小型經濟體，大部份原料物資都依賴進口，大部份生產都需要出口，不可能閉關自守，完全沒有採行孤立主義或保護主義的條件。自從 1950 年代中期開始，台灣一直是全球化的得益者，所以台灣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必須設法補償輸家，防範風險，推廣教育，培養人才，投資研發，增強競爭力，改善社會安全網，還應當繼續支持全球化。

我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參考文獻

- Fleming, J. Marcus (1962), "Domestic Financial Policies under Fixed and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IMF Staff Papers, 9(3): 369–380.
- Maddison, Angus (2006), The World Economy: Vol.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and Vol.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Friedman, Thomas L. (2005),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Mundell, Robert A. (1963),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9(4): 475–485.
-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 Samuelson, Paul A. (1948),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sation of Factor Prices", The Economic Journal, 58(230): 163–184.
- Tobin, James (1978), "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4(3/4): 153–159.